

曼哈顿过来

钱锺书致夏志清的英文信

海龙

夏志清对钱锺书的欣赏与推崇众所周知，但其实，在1979年钱锺书访美前，他们二人只见过一面，还是很多年前——那是1943年的上海，在双方共同友人宋淇家的一个晚会上。其时钱锺书是风流倜傥的才子，夏志清还是惨绿的文青。没想到差不多二十年后，钱氏成了夏志清英文教科书《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更让改革开放后的钱锺书像被重新发掘出土的文物一样如日中天。这为二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再次聚首做好了铺垫。

钱夏二人对在纽约哥大重逢都有记述，此不多赘。这次相见开启了互动模式，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近日笔者有缘睹其后钱致夏的全部通信。关注他们间的交流对当代文学史探讨和文人交往史研究等都有意义。

再次相遇，今非昔比，钱锺书对夏志清的态度一开始也极为热情。他给夏志清写信二十一封。仅1979年就有九封。以后减少，次年三封，再次年五封……其后至1986年一封外十年间几无通信；而最后一封信是在1994年，可以看成是二人的告别信了。

值得注意的是，钱致夏全部通信中有三封是英文信，皆写于1979年。钱夏二人当然中英文皆通，选用何种语言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写信人为什么绝大多数用中文而惟此三封信用英文写呢？而且，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段用英文写？笔者将原文试译如下，或许能帮助大家了解其中原因。

亲爱的志清：

洛杉矶是我们最后一站，却也是我在冗繁的行程中所仅能挤出的第一个晚上来再跟您握手说再见。我现在给您写信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我回去后会非常繁忙，为冗务所扰。估计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才能有时间为您写一封像样的信呢。

与您再次会面，使我欢欣无限。咱们四十年间只见过两次面并不算多，但时光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魔术师，它将我们四十年前一个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式的偶识缔结成了一种亲情；进而绽放成一种丰硕的成熟的友情！您对您的评论颇具神奇的魅力。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您知道这个。我刚刚收到一封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主任的信，谈了翻译和出版我小说的细节。此书是珍妮·凯利翻译，茅国权审核的。凯利女士六年前曾给我写过信，现在她勇敢地吧这任务完成了。我希望她该是个漂亮的女人（“你这个老东西！”）我能想象您读到此处一定会大笑的。

替我向候夫人。希望吾兄每天欢笑快乐！请替我致意玛莎，真的是非常遗憾我们未能尽情畅叙。

您永远的，钱锺书(1979-05-06)

这封信（见刊头图）写于洛杉矶钱锺书访美将归之际。虽以叙友情为主，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其中一句话可以被看成是此信的关键句：“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您知道这个。”——钱锺书是个非常清高自许的人。晚年因小说暴露大名以至大红大紫，而那时的他尚有些不适应，他下意识地说了实话。这种心理使他在下一封英文信里又旧调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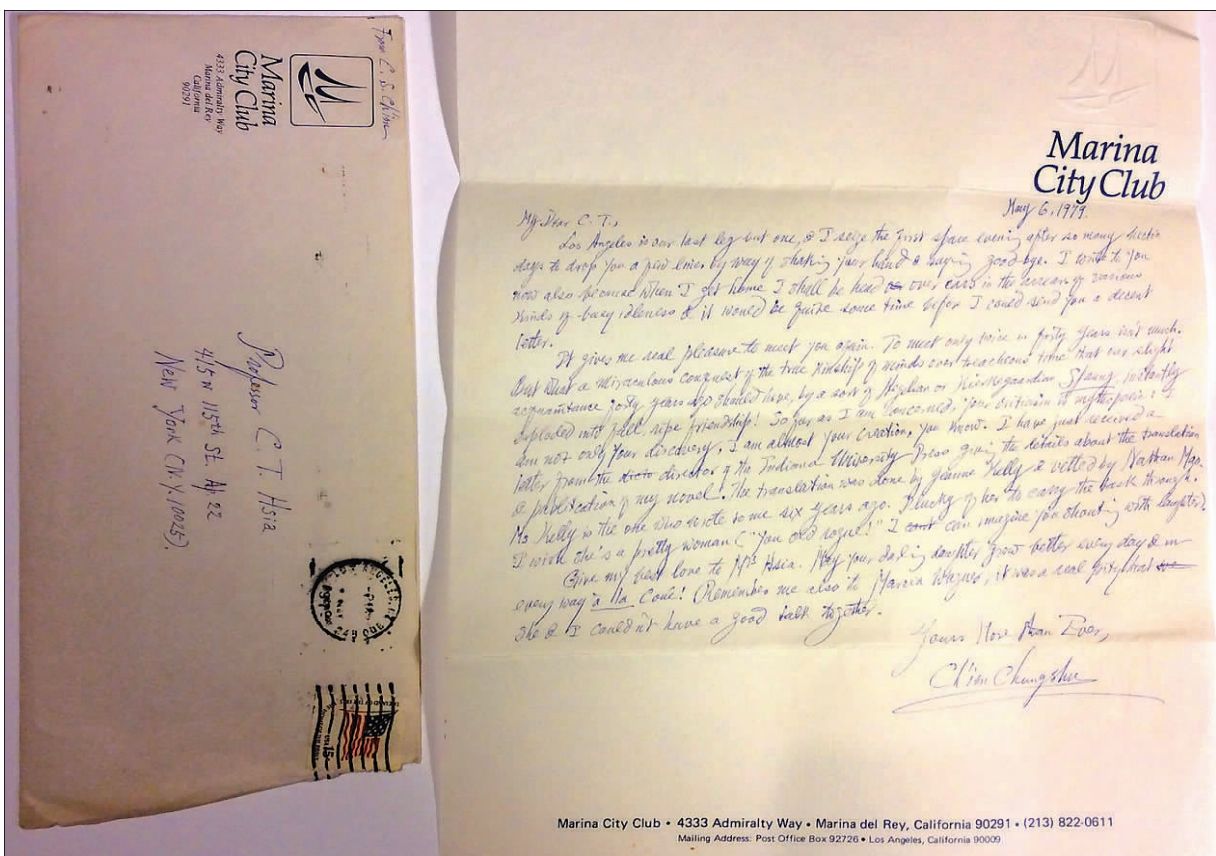
我亲爱的志清：

一周前，我以小肚鸡肠的怯懦对您恣心叙对我的慷慨赞扬提出了抗议。您的话语对那些甚至在障碍重重的环境下用无力的愤怒和不情愿的赞美眼光来看待您的人那里也是分量极重的。您对我特殊的心仪将会很大程度上地在我生存的环境中引起妒忌，并招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阴暗交界处的相对朦胧的状态。受人关注，是另一种形式的晾晒于宣传的聚光灯下，是不值得怜悯的。请原谅我这种老古董式的自负。除此之外，当是我对您恒久和深深的感激之情。

耿德华给我内人写了信，杨绛回复了他所要的《简历》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她让我代她对您对她的那些富骑士风的赞誉之词表示感谢。

根据吾兄之建议，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科尔曼女士给我写信，要我的照片来装点他们出版我的小说的译者。我已经逃避照相多年了。我最近的护照和工作证上的照片都看上去更像是罪犯栏上的照片，却不适宜放在书里。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五十岁时拍的那张照片剪掉一半寄给她。——此刻我心之耳已经听到了您在咯咯抑或狂笑我的虚荣了！我刚刚去咯了几帧，也寄给您一帧作为我和内人给您的一个纪念罢了。专此，即颂双福！

您永远的，钱锺书 杨绛同候 (1979-07-14)



Marina City Club • 4333 Admiralty Way • Marina del Rey, California 90291 • (213) 822-0611

笔会 记录

十多年前，我写《倾听台静农》时，自己觉得搜集的资料已较完备、详实了。然，非也。最近读到陶英惠先生述说他亲力亲为的有关台静农的一件往事，深为感动，现写出与大家分享。

陶英惠，史学工作者，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4年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秘书组组长和胡适纪念馆主任，直至退休。陶先生腹笥丰盈，著有《中研院六院长》《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蒋冯书简新编》等。笔者近年专事“民国文化人背影”系列写作，常向陶先生请益，先生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常为拙作匡误，受惠良多，遂结识亦师亦友之缘。

台静农（1903—1990），北京大学国文学研究所肄业，先后执教于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和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自1928年后六年间，他先后三次无辜被捕入狱。他是鲁迅的学生，1932年他全程陪同鲁迅在北平作五次演讲，鲁迅对其厚爱有加。台静农每次下狱，鲁迅都竭力援救。1946年为抗议教育部对白沙女师风潮的野蛮处理，愤而离校。迫于生计，应许寿裳之邀赴台湾大学执教，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一做二十年直至退休。他的治学严谨，待人宽厚与人生追求的执著，影响了台湾一代学人。1960年《自由中国》被判“罪”停刊，雷震等被捕，编委聂华苓被监控；他人骤之不及，台静农却亲自出马，把聂华苓请上台大讲台。台湾学界因此赞他：

“于玩世中恭谨作人”

——台静农轶事一则

张昌华

“学问、襟抱、道德、文章，尤令后人敬仰。”

台静农对民俗学、书法史和中国百年思想史有独到的研究。他才多才艺、工书、善画，亦能治印。他追慕晚明书家倪元璐，张大千称他是“三百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他的书法以草隶见长：草书奇逸，隶书端凝。启功形容他的字错节盘根，玉质金相。台静农亦喜欢收藏，鲁迅的讲稿《娜拉走后怎样》即为其一。据资料，他生前珍藏倪元璐五幅真迹，于去世前三个月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静农还收藏了蔡元培先生题赠张目寒的条幅。在他病危期间，家里人问他这幅字何从得来。他说是以五幅自己的字向人家换来的。台静农之所以珍爱这幅字，除了对蔡元培的崇敬外，还因为受字者张目寒是他的同学，他与鲁迅的相识也是经张目寒介绍的。1989年9月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访台看望台静农，回大陆后在《团结报》发文，访谈台静农时，披露台静农家有一幅蔡元培墨宝。蔡元培的四子蔡怀新，时在复旦上大学，谈

到这篇文章后，就写信给陶英惠——还在于前年，陶英惠访问上海蔡元培故居，蔡怀新与其姐蔡辟益曾留宿、接待过他。蔡怀新信中间能否得到一张台公馆提供的父亲手迹照片。陶英惠入台大时读中文系，虽台先生是台静农的学生，但无过从，二年级时就随人历史系师从历史学家姚从吾，与李敖同班。他接信后，于1990年7月9日径致书台先生，说明蔡怀新的后人想得到那幅墨宝的照片，敬请惠允。是时台静农患食道癌，病势沉重，由他的学生、台大张亨教授代复陶英惠，同时寄上一张台先生与那幅字的合影。信中又说，台先生有意物归原主，如果蔡先生的公子来信写个收据，便无条件归还。台先生的义举令陶英惠十分感动。当时，蔡怀新家无电话联络，陶只能致函蔡怀新，请他火速回复并把收据寄来，以便他持条来取。可这封信偏偏写得极慢，久久不见复，而台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台先生的公子台益坚对父亲说：“蔡家既然到现在没有回信，这幅字就留给我们做纪念吧！”台先生

已不能言语，但用手示意：“不可以！我已答应送还蔡家，你们不能留下！”家人想在老人还在世时了却他的心愿，通过“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庄申庚转告陶英惠，台先生恐来日无多，强调台先生愿意将那幅字送还蔡家，这必将字留在家要有意义得多。因迟迟得不到蔡家回复，最后商定先由陶英惠代蔡怀新出具一纸收据，把字拿走，再转蔡家。陶英惠觉得这是一件成全老人心愿的好事，便写下收据领了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此贵重物件，陶英惠唯恐有失，不敢邮寄。适1992年4月29日，上海社科院汤志钧教授到台北作学术交流，陶英惠遂托汤教授将那幅字带回上海交给蔡怀新。

就蔡元培墨宝完璧归赵这件事，陶英惠先生十分感慨地说：“台先生珍藏的蔡怀新的这幅墨宝，蔡家人只希望得到一张照片，而台先生不仅先送照片，而且坚持完璧归赵。在世风浇薄的今天，这种事太少了。”这也印证了台先生常书赠友人的名言：“于玩世中恭谨作人”。

您永远的， 钱锺书 (1979-08-09)

钱致夏信件封套，中文信占绝大多数，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表郑重用毛笔书写的。读完了上面三封信，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什么独这几封信要用英文写了。钱氏写信喜用文言，文言也最易于表达皮里阳秋或虚与委蛇的含混的客套话。但是这三封信的内容，钱锺书仍觉得用中文、哪怕是文言文都不够妥贴而且不易到位。那些微妙情愫用汉语表述都容易有肉麻且过于直捷之嫌，远不如英语来得委婉蕴藉、不着痕迹。

这一推论并不是出于猜测和臆断。在钱夏通信史上，亦即在这三封英文信以前和以后，还有大量中文信可以对照。即使是在中文信里，每当写到这类内容时钱锺书皆喜用西文，以中英文混杂的形式处理；凡中文表达不宜或不妥处他皆以英文出之。可是全部用英文写就的信仅这三封。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钱锺书是个非常智慧幽默的人。用中文写作他固然是一个幽默大师，可有些诙谐幽默或修辞黏连式巧思更适合用外语表述。这样，善用双关和诙谐的钱夏二人用起英文来写则更是如鱼得水了。这大概也是钱氏选用英文写信的另一个原因罢。

通读钱夏全部通信，这三封英文信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它们表述着不一样的心情，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因而也有着殊异的文献意义。

苏州是状元之乡。画家吴湖帆当年曾专门收集苏州状元扇，数量多达七十二把。改革开放后，苏州又出了不少“书法状元”，有名的有1979年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夺冠的沙曼翁（1916—2011）、1984年在文汇报书法大赛获得金奖的谭以文，与1989年在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会荣获金榜的瓦翁（原名卫东晨，1908—2008），他们都是因为书法获奖而闻名鹊起，是当代姑苏艺苑的名书法家。

我跟苏州的书法状元有缘，和瓦翁薄有交往。闻沙曼翁之名，在晚年曾专程到苏州拜访过一次。光阴荏苒，现在两位先生去世有好多年了，有关他们的故事似乎值得写一写了。

第一次拜访瓦翁是在1990年初。我通过友人朱永灵的关系，在回浙江家乡的途中，由苏州下车，黄昏时节，在人民路的乐桥晚敲响瓦翁的家门。瓦翁开门，探出半个头，见是陌生人，用吴侬软语问：“找啥人？”我报出友人和自己的姓名，瓦翁把我让进了屋，在不大的客厅坐下来，一杯清茶。壁上挂着上海画家程十发、台北作家三毛写给他的信。交谈就顺着壁间那些珍贵的书信展开……此次拜访，瓦翁留给我一个老派、儒雅的苏州人的印象。

每每听到这位姑苏文艺界人瑞的传闻，总想和他再见面，验证从朋友那里获得的和他有关的一切。2005年元旦上午，我如约又一次拜访瓦翁。这是苏州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我按瓦翁在电话里交代我的地址找过去。小巷深处，北风呼啸。瓦翁闻声出来，开门的刹那，迎接我的是一张矜持的笑脸，一声“小唐”，把我拉到十多年年前与他初见的场景。不过这回开门后，他直接拉我进门，里面的空调送着暖风，温暖如春。瓦翁已97岁，这是他儿子的家。宽大的客厅显得气派，一张大书桌横放在客厅的一角，背面是一排书架，林林总总摆满了书，书案上疏疏落落放着些文玩、书信，书案上还有一盆高嵩蒲和一盆插着玫瑰的花瓶，与书案相对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副水印鄂沐若手书对联“飞雪迎春到，风雨送春归”，对联上头头，我一眼差点认作真迹。客厅北墙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嵌着陆俨少用隶书题写的“瓦翁印痕”。这是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书斋。由书斋让人想到同样收拾得一丝不苟的瓦翁，深深透着都市老派文人的文明和儒雅。

已经90岁了，他瓦翁的精神好得出奇，落座，泡茶，他张罗着，井然有序。

承他提醒，在许多年前，我们曾在南京的金陵饭店见过一面。我于是记起了当年的场景：瓦翁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风尘仆仆从苏州赶到南京，下车后居然毫无倦意地出现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同桌还有苏州国画家张继馨，张先生虽小他20岁，精神反略逊于瓦翁，为此我们都称瓦翁为老神仙。瓦翁跟我谈苏州的文艺界，谈苏州艺坛的老前辈。他感慨，现在苏州的老辈比不上从前了，健在的，也不大出门了。沙曼翁身体不好，走出去常常迷路，吴敦木85岁，身体还好，在家里挥毫不止……

瓦翁谈话的内容时常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好在老人家总是及时调整话头，让我好从短暂的困顿中回过神来。瓦翁告诉我至今还在看西方美学、哲学，以如此高龄尚能倾力读书，即便如陶渊明所说读书不求甚解，也值得敬佩。更佩服他的思路、口才，不假思索，即能滔滔如大河，直泻千里。听其清言妙语，突然感悟到姑苏文化的绵力，真是后劲无穷。

台北作家三毛曾说瓦翁是“苏州美人”，我的感受则是，瓦翁的精彩，不止是青年而神明不衰，也不是到了晚年还能执笔写工谨的小楷，更不是面对各种场面说话的得体文采，而是他身上透着的老苏州温润的韵味，浸染着诗画文章的儒雅。

如今，我还记得他那些在坊间盛传不衰的段子。晚年瓦翁在自用的策杖上，自铭四字：大力支持。白话文，谁都看得明白，却深涵意味。有人说，瓦翁有此杖，却从未见他用过。还有，他不止一次跟年轻朋友说过，他在家订二种报纸：《人民日报》《文艺报》，并说《文艺报》是文艺工作者的报。

我自己遇到的故事：一次瓦翁在某热闹场合，好多人围过来问长问短，一个饭桌和他们聊得热络。后来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席间，我跟他讲：卫老，您的记忆力真好，居然都记得他们的名字！瓦翁回答：也不是。不过遇到忘记的，先跟他们寒暄，然后问他们最近还在原单位还是换单位了，电话号码还是那个？对方一般就把新名片递过来了。

瓦翁的应酬技巧充满了智慧。文艺家岂止写写画画，还得有一双善体世道人心的慧眼，连同一颗敏感的心。

和瓦翁比起来，沙曼翁是另一类风格，木讷，却善于内省和思考。如果说苏州有正宗的书家和印人，沙曼翁就是毫无愧色的一家。沙曼翁是我长久以来特别想见的人，经苏州友人疏通，我在2007年秋天的某个晚上与沙先生匆匆见了一面。那时的沙曼翁已患轻度老年痴呆症，无法和一个陌生人作正常的交流了。矮小的沙曼翁，完全没有他笔下

的“于玩世中恭谨作人”。

姑苏的两位『书法状元』

记瓦翁和沙曼翁 唐吟方

书法的气象，见面后重复问同样的问题，有些话要重复回答。原本预备请教的问题，现场的气氛根本不允许提出来，也不忍心再开口问了。尽管来之前已知道情况，没想到现实比预料的更糟糕，真有点怅然。

我提出来看看沙曼翁的斗室，他的家人带我看了。那个在书法界名气很大的“听蕉馆”，实际上只是搭出来的一个“披”，按现在的说法是“违建”。看着沙曼翁这间人间过路式的“听蕉馆”，心里有点辛酸，内心反复叫问：许多作品就是从这边走出来的？

拜访沙曼翁就这样结束。虽然不满足，毕竟了却了心愿，和沙先生见的面，而且总算有了交流，尽管只是单向的交流。

沙曼翁本人只是一个小学教师，凭借1979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一场书法比赛才名扬艺坛；他本是印人，却以书法夺魁闻名。林散之当时对沙曼翁青睐有加，曾邀请他到南京家里住了一周，还亲自写信推荐给江苏美术馆办展览。林散之曾赋诗相赠：能从汉简惊时辈，更过晋书傲俗儒；左旋右抽今古字，纵横篆出太平符。从中可看出林散之对沙曼翁的激赏。

在苏州老一辈书法家家中，费新我、谢孝思、张辛稼、吴敦木等都是画家出身的书家，想象空间大；瓦翁是以游艺的心态想书法，文心为艺；吴进贤、祝嘉、宋季丁以学攻书，各有路向，独有沙曼翁是印人出身的书家，工于篆隶，又具金石豪情。他对于艺术的追求近乎苛刻，标准可谓高矣，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去实践。

我看到过沙曼翁1984年写的一则印跋，表达了他对艺术的看法：

学篆刻当以秦玺印为正宗。秦汉以下则不可学，亦不必学也。盖自汉以后文字之学与夫篆刻艺术渐趋衰落。隋及明代，虽出文何，另辟蹊径，创为吴门派，但其篆体篆艺则法唐李阳凝、元赵吴兴，失之秦汉规矩，格调低下，趣时媚俗，去古益远矣。余童年学篆刻，初不明正宗，先以学书篆隶。识谱篆始，复谈秦汉印篆，心追手摹，略有长进，因知篆刻者必能书，而能书者未必学篆刻也。从事篆刻创作凡善于安排章法者，乃得佳制。凡六书之学不明，章法乖误，遂成俗品。是以学者书者当于书外求书，篆家印者当于印外求印，易言之，即须读书求学问，立品德，重修养，自能入正道，除俗气，于艺事大有裨益矣。此卷诸印皆近廿年来旧作。曲辰先生索余钱拓，由魏穆之弟为之，阅竟记数语归之。甲子冬月曼翁时七十。

讲的是篆刻，其实岂独是篆刻，书法何尝不是如此。

1994年，沙曼翁在致函浙江一位印人时，又申述同样的观点：“篆刻艺术以浅人看来似乎容易，实则与书法、绘画同样难于精到。一般俗工以刀碰石，毫无境界，何足论？书画印三者必须读书，读书能明理、明法、明作人之道。”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沙曼翁的艺术立场，为艺须先读书明理，这和前人所谈“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主张是一致的。

两位苏州的“书法状元”，晚年都以一艺之长殊途同归，进入江苏省文史馆，成为一省翰林院的成员。

2017年7月14日北京仰山楼